

内部讨论
切勿外传、引用

中国妇女运动史

(1919—1949)

第六编

全国妇联

1988、5

第六编 夺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

胜利，中国妇女翻身解放

(1945·9——1949·10)

第一章 中国妇女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945·9——1946·6)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的愿望，提出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方针。中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进行这场斗争。国统区妇女是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解放区妇女进行减租减息、生产运动，建设和发展解放区，並作好自卫战争的一切准备。

第一节 国统区妇女是反对内战，

争取和平民主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妇女联谊会为国统区妇女界反战民主斗争的旗帜

中国妇女联谊会的领导者和会员有不少人 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秘密党员，也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妇女，300多人分成25个学习小组，经常研究时事和妇女问题。她们分散在各个工作岗位开展活动。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的第二天，中国妇女联谊会即发表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时局宣言》，提出了七条政治主张：1、彻底解除敌伪武装，严惩战犯；2、警惕那些企图独占抗战成果的人发动内战的阴谋；3、召开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公正人士的紧急政治会议，组织举国一致的政府；4、释放全国政治犯；5、废除一切战时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6、取消一切战时赋税、

兵役；7、保障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及文化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1945年11月7日，在国民党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派兵进攻解放区的形势下，中国妇女联谊会发出《紧急呼吁》，提出了四项要求：1、立即停止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目前军事冲突和国共谈判纪要中未予解决的问题。2、组织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的军事调查团，严惩内战祸首。3、迅速彻底解除敌伪武装，逮捕战犯与汉奸。4、立即撤退在华美军。1946年1月3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又发表《对当前政治意见书》，提出了停止内战、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改组政府、满足妇女的基本要求以及关于军事和国民大会等六个方面的政治意见。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妇女联谊会曾致函并附捐款十万元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中的罹难者。以新年同乐会及招待会方式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转达妇女的呼声，并积极参与了政治协商会议各界协进会及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诸活动。当国民党特务对参加政协各界协进会的群众大打出手，制造沧白堂事件时，中国妇女联谊会会员在会场维持秩序，表现坚定。较场口事件发生时，作为大会主席团的李德全、刘清扬、曹孟君等面对暴徒捣乱临危不惧。

抗战胜利后，中国妇女联谊会总会准备迁往南京。在最后一次理事会上决定，本会理事与会员不论到什么地都要继续发挥作用。许多成员随其职业岗位变动纷纷复员，分布南京、上海、北平、重庆各地，因而上海、重庆、北平、南京以及香港先后相继成立了五个分会，这些分会又在各地团结了许多民主妇女，在民主运动中和妇女运动中都为争取和平、民主、自由起着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自发的产生了民主妇女的组织，同时也因为在反动政治的高压下，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联谊”二字作为团体

的名称，在组织上却是各自独立的，和中国妇女联谊会保持着姊妹一般亲切的关系。其中的云南妇女联谊会成立于1945年“一二·一”昆明血案发生后，到1946年“三八”时，会员发展到300多人，成分包括职业妇女、女学生和女工。后又成立路南县分会，有会员80多人，成分有教员、公务员、中学生和家庭妇女，其下还有3个乡镇区分会，会员成分都是农妇。成都的民主妇女，在《新民报》付刊《女型》编委会周围，组织了一个“女型社”，经常举行学习座谈会，1946年在筹备“三八”纪念会上，决定以女型社为基础，进一步团结进步的中学女教员和大学生共100余人，在“三八”节成立了成都妇女联谊会。桂林一部分女学生团结了一般进步的职业妇女和中学生，在1946年4月，组织了桂林妇女联谊会。1946年4月1日，港九民主妇女成立了港九妇女联谊会，曾向英政府当局登记，取得“合法”地位，会员约300人，成分以职业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较少。1946年3月6日由罗叔章、史良、曹孟君发起成立上海妇女联谊会，该会是由42个妇女团体会员组成，其中有女工、职业妇女、女学生、家庭妇女，合计群众5万多人。

同年4月7日重庆建立妇女联谊会时，中共南方局妇委为避免总会在组织上、工作上的局限性，曾提三条具体改进意见。第一，不要单纯搞政治斗争，要重视举办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从关心妇女的切身利益出发引导妇女参加政治斗争；第二，理事会组成要体现统一战线政策，改变清一色，由进步领袖、政治家参加的情况，吸收一部分中间人士和职业家参加；第三，组织不要局限于中上层进步分子的小圈子，要通过中上层分子去发动中下层分子，通过进步分子去发动中间分子。按照南方局妇委的指示，重庆妇女联谊会从一成立起，就办成了各阶层民主妇女的联合组织，并开展多种形式活动，举办妇女儿童

福利事业，受到群众的欢迎。

妇女联谊会的组织由于有着鲜明的民主进步倾向，是被国民党政府认为非法的，因此它经常遭受着统治者的迫害。中国妇女联谊会、分会和各地妇女联谊会注意团结各个阶层的进步的、民主的职业妇女、女学生、家庭妇女，在整个国统区民主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浪潮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一二·一”运动中的云南妇女是妇女界反对内战的先锋

1945年11月底，昆明三万学生罢课，要求立即停止内战，撤退在中国的美国侵略军，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这一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统区人民反内战运动迅速高涨的标志。

11月25日夜，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语专科学校联合举行时事报告晚会，6千多名学生和机关商店职工聚集在西南联大的草坪听进步教授费孝通、钱瑞升等有关战后中国形势的报告。但是，会场被国民党昆明守军所包围，并派进特务分子进入会场捣乱，子弹从与会者头上呼啸而过，在枪声中，学生通过了制止内战及吁请美国青年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最后，大会被昆明守军、特务以手榴弹、手枪、步枪及机关枪所驱散。为抗议国民党武装包围、镇压学生的暴行，自26日起昆明学生展开了大规模的罢课和示威游行。云南国民党当局随即有计划地布置了对于学生运动的破坏和镇压。

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三年级30岁的学生潘琰，是中共秘密党员。罢课后她参加了西南联大第一宣传队，分管联系昆华商业学校。12月1日中午，潘琰和第一宣传队的同学从商校回到西南联大，还没离开饭厅，就见国民党省党部派来的暴徒呼喊着急冲进学校，举着棍棒打手无寸铁的学生。潘琰大喝一声越窗而出，和同学们一起驱赶暴徒。

暴徒边退边打，并向学生掷了三颗手榴弹。潘琰头部被击伤，腹部被炸伤，倚墙站立时又被暴徒用刺刀连刺三刀。当同学们来救护她时，她已气息奄奄，挣扎着说：“同学们，团结呀。”她被送进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她留下的遗言是“斗争！斗争！”。潘琰与“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鲁连，荀极中、于再，并称“一二·一”四烈士。

在昆明学生反内战运动中，具有革命传统的昆华女中有100多名同学参加了西南联大25日的时事报告会。翌日，昆华女中成立了全市中学里最早的罢课委员会。28日，昆明市大中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成立，昆华女中被推选为五个常委学校之一。“一二·一”惨案后，罢课委员会立即派出联络员前去慰问。12月2日，四烈士入殓，昆华女中400多位同学列队前去吊唁。4日公祭时，在国民党反动恐怖统治下，昆华女中90%以上的同学以各种方式前往祭奠。5日，昆明学生万人再次罢课抗议当局惨无人道的屠杀。

“一二·一”惨案后，云南妇女联谊会在血的洗礼中诞生了。西南联大学生马如瑛、云南大学学生李靖珠、昆华女中的徐菊英等参加了该妇女联谊会工作。李文宜被推为联谊会主席。成立大会通过了《云南妇女联谊会成立宣言》、《反内战声援学生斗争宣言》、《为一二·一惨案抗议中国法西斯暴行向美国妇女呼吁书》。云南妇女联谊会募得捐款16.7万元交给罢课联合委员会。1946年“三八”节，云南妇女联谊会演出自己编导的话剧《潘琰传》，并与《妇女旬刊》社等17个单位共同筹办了纪念大会。会后，1000多人列队前往西南联大吊唁四烈士，沿途张贴标语，一路高呼口号：“云南各界妇女同胞团结起来共谋解放！”“为潘琰烈士复仇！”。这是昆明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大游行。3月17日，昆明各界为四烈士举行葬礼。云南

妇女联谊会设有路祭写了祭文，在3万多人的送殡队伍中有女学生、女教师、女公务人员、农妇等。在悼念中，妇女写下了许多挽诗挽联。其中《妇女旬刊》社的挽联集中表达了妇女的心声。其词为：大学生何负国家，除军阀，打汉奸，争自由，反内战，流血以殉主张，南北争光，昆市荣名继燕市，弱女子效忠民族，离慈母，赴戎行，抗暴徒，护朋友，至死犹呼团结，东西辉映，琰娘英武似丹娘。

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发生是国内反内战争取和平运动的肇端，从此斗争从分散、零碎的斗争继而转为有组织、有力量的斗争。云南妇女在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崛起。

三、战后第一个“三八”节纪念活动

1946年的“三八”节是抗战胜利、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纪念的第一个“三八”节。整个“三八”纪念筹备活动和纪念大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妇女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维护政协决议的真诚愿望。但是，活动中也充满了尖锐的斗争。

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邓颖超在《现代妇女》社座谈会上报告政协经过，并提出妇女要学习政协协议作风，主张不同党派的妇女团体应共同筹备“三八”纪念活动。在筹备会上，邓颖超代表解放区妇女团体始终不失自己的立场，依靠民盟妇女和进步妇女力量，争取了中间派妇女力量，孤立了顽固分子。筹备会通过了以巩固世界与中国和平、积极推进民主建设，要求各党派长期合作，加强国际妇女团结，彻底实现政协关于妇女权利的决议等为中心的宣传大纲、宣言草案和口号等。在最后一次筹备会上国民党右派动员了许多从未见过的“妇女团体代表”，专来竞选主席团，中间妇女团体十分鄙视新运妇指会指使下的这种做法。结果中共邓颖超与民主同盟的姊妹都没当选为主席团成员，邓颖超当即坦然地声明说：这没关系，我们应该尊重已经

决定的一切，自始至终我们只要求工作，从来没想到主席团不主席团的问题。中共妇女代表的态度，博得民主妇女团体的深深敬佩。

“三八”纪念会上，参加大会的有各界妇女6000人，美、苏、英、法、比等国妇女均有代表参加。大会总主席宋美龄致词后，邓颖超在会上讲话，号召妇女加强团结，保障和平争取民主。邓颖超在会上说：我热忱希望各党派无党派的妇女团结合作。最后她说：“我们要靠自己强大的力量与奋斗，不怕牺牲，不怕曲折，定要使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建设成功”。在她讲话时，掌声时常淹没了她的声音。这次妇女集会显示了大家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对国家前途的关切。也显示了渝市各党派各阶层妇女大团结，粉碎了法西斯破坏大会的阴谋。

上海5万妇女在上海妇女联谊会领导下在兆丰公园广场举行大会。主席团由许广平、罗叔章、俞庆棠、沈粹缜等知名人士组成。许广平宣布开会说：“我们纪念妇女节，一定要大家团结起来，因为团结就是力量。纪念今年的三八节，希望妇女们都要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努力，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会上通过了宣言和通电。会后，2万人的游行队伍一路游行到外滩。这次游行对于长期沦陷后的上海市民注射了新鲜的血液，振奋了上海妇女的斗争意志，同时对国统区各地的妇女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四、上海妇女自动选举国大女代表和“6·23”和平请愿

根据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大会代表总数为2·050名，其中已有旧国大代表950名，尚有1,100名待选。在旧国大代表中，妇女名额仅占一百九十分之一。经过政协会议的争取，在国大代表选举补充条例中规定各妇女团体可选 名代表。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名额中可选妇女代表 22 名，再加上其他方面应产生代表数，总共可

新选女代表57名。这个代表名额虽然太少，但从当时整个局势考虑，揭露国民党假和平、假民主的实质，争取实现政治民主化，中共南方局妇委支持民主妇女所进行的选举国大女代表活动。

3月底，中国妇女联谊会电促上海各妇女团体，迅即投入“国大”代表选举，在上海地区选出35名“国大”女代表。

上海人民对政协决议中关于5月5日行将召开的国民大会给予很大的关注。

这次普选是3月30日开始，由上海妇女联谊会上海女青年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等妇女团体联合组织国大代表选举筹备会，下设总务、财务、宣传、联络等4组。同时将参加选举的妇女分成职业妇女、劳工妇女、女学生、家庭妇女4个单位，一切选举的手续和方式都是按照国民大会选举法进行，所不同的是不准包办贿赂以及其它不合法不合理的现象发生。4月16日晚当选代表35名揭晓。以文化界许广平得票最多，计10,829票，其次是沪西女工潘月英10,127票。35名代表包括女工、文教卫生、金融、工业、学生及各种职业妇女、军界代表。她们都是接近群众、得到群众信任与拥护的妇女界人物，女代表的产生是根据大众的意旨，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民主生活的演习，使妇女群众受到了民主教育。

紧接着国大女代表的选举之后，上海妇女又展开了宪法的研讨工作，拟订立一个“宪法草案与国民大会问题研究大纲”。4月28日，35位当选代表曾集会研讨，准备将大纲分发各妇女团体讨论，后因国民代表大会改期，内战局势日趋紧张，这一工作搁置下来。

1946年6月当国民党反动政府向苏北、华北积极布置军事，准备大规模的向解放区进攻时，上海60余人民团体推派代表于6月23日到南京请愿。上海的女学生、女工和民主妇女积极参加了10万人

以上的欢送代表大会。会后並参加了反内战大游行。代表到了南京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受伤多人。女代表雷洁琼身受重伤，京京妇女联谊会会员、女记者浦熙修也遭殴打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下关惨案的发生，使全国人民擦亮了眼睛，认识到光是和平请愿是不够的，全国工农兵学商要用行动来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向纵深发展。

第二节 解放区妇女投入巩固、发展解放区的斗争和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一、新解放区妇女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努力生产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解放区民主政府在新收复区首先对贫苦人民进行赈济，发放粮、款、衣物，在城市扶持工商矿业生产，初步稳定了新收复区的秩序。在人民的要求下，自1945年底至1946年春，在新区普遍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民主政府公审和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有血债的日伪汉奸、恶霸地主，新区人民开始了翻身运动。新区妇女在斗争中受到了教育，並且发挥了自已的作用。

在反奸清算斗争中，妇女吐苦水、挖穷根，对恶霸地主进行了血泪控诉。华中丰乐镇的镇民大会上，李石富老婆戴着白孝帽，围着一幅破旧的兰布裙子，高高的站在凳子上向大家控诉恶霸地主蒋子余父子三人逼租逼死她丈夫的罪行。愤怒地向蒋家父子讨回欠她的血债。血泪的控诉激起了群众对汉奸地主的深仇大恨，人们纷纷上台控诉，不少妇女也走上了斗争地主的台上。一人诉苦引起了众人诉苦，认识

到一家一户与地主的仇是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人民法庭公审了蒋氏父子。有力的控诉使地主无法抵赖，不得不向农民低头，跪在大家面前承认了罪恶，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农妇在斗争中找到了穷根，阶级觉悟提高了。她们认识到以前在家没吃没喝没衣穿，家庭不和睦、挨打受气，其根源就是由于地主的剥削与压迫。农妇和农民团结起来一起斗地主，一起翻身求解放。她们提出了“一人穷，一家受穷，娘们汉们一起倒苦水，一起求解放”的口号，使斗争向纵深发展。农妇经过说理斗争，获得了斗争果实。冀东三河镇东错桥村 200 多妇女团结起来斗争拥有 3 顷土地的日伪团长张连及狗腿子张淇。妇女代表雷秀珍在历数了张连的罪状后说：“今天我们再也不受你们的剥削，你们欠下的血债一定要还清。”张连在农妇面前伏了罪。用粮、款来偿还他欠下剥削债。妇女还查出他的黑地，当即把斗争果实公平地分配给贫农抗属。

妇女在斗争中显示了力量，提高了觉悟，推动了反奸清算斗争。据清江市韩南庄统计，在一个清算大会上，12 个发言人中有 8 个是妇女。在集体去市府请求惩办汉奸的 400 人中有 300 名妇女，代表农民向市长提出严惩汉奸的 14 人中有 12 个是妇女。孔庙镇的田素珍，亲自动员妇女，领导了一个三四百人的说理斗争会，使顽固不化的汉奸地主低头认罪。苏皖射阳陈洋区妇女在斗争中算回血债田两顷多，粮食 100 多斛。闸河村王秀英的丈夫，私下受了地主 200 斛稻就不想斗争了，王秀英说服丈夫坚决不上地主的当。在反奸清算斗争中涌现了惩奸女英雄。苏皖靖江二区孔庙镇的徐君慧是付镇长的妻子，她和丈夫一起不循私情，当地主用大叠钞票想求她在镇长面前帮忙逃避斗争时，受到她的严厉斥责。在反奸清算斗争中妇女发挥了作用，群众说：妇女出了头，力量大如牛。

妇女不但在反奸反恶霸中起了很大作用，而且还积极参加生产，从经济上翻身。单华中阜东就有5400个妇女参加纺织小组。射阳汤庄村妇女在妇联会领导下，提出“不做懒婆娘，与男人一样生产”的口号，编成割麦、拾麦、抬水组，大家忙得十分有劲。

由于妇联会在反奸清算斗争和生产中发挥了作用，新区妇联会也壮大起来了。一些平素反对媳妇、女儿参加妇联会的婆妈也成了妇联会的支持者了。新解放区的察北妇女翻身后，6个县共建村妇联会365个，会员达2.381万人。

到1946年4月，由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的开展，新解放区部分农民得到了土地、房屋、农具等斗争果实。翻身后的男女农民努力生产、建设和巩固解放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在组织新区妇女参加生产，尤其是纺织生产上，山东省政府和山东省妇联首创性地创了解放区第一个生产推进社。1945年9月，山东临沂解放后，城里失业的人很多，农村经济也濒于破产。为了发展新区生产，从根本上改善群众的生活，也为了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迅速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已是刻不容缓的习情。然而，要在临沂组织纺织等生产很困难，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也缺乏积极分子作骨干，还由于当地群众曾受日伪时期合作社的欺骗和剥削，一时群众不了解民主政府办纺织合作社的性质，因此群众对搞纺织合作社有疑虑。而民间纺织也因贫苦的群众一无工具二无资金无法进行。鉴于这种情况，省政府实验厅和省妇联联合办起了临沂生产推进社，由政府贷款扶植民间纺织。从1945年冬开始，由省政府的王根今和省妇联的罗琼等四人负责领导这项工作。政府先后拨出55万元本币资金，为群众贷棉花、纺车，发棉收线、发线收布，解决供销，扶助群众进行纺织生产。到1946年1月，仅三个月的时间，发展了纺妇850户、织妇29

户，组织了210个纺织小组。共贷出棉花2722斤、纺车568辆、幌线车57辆。妇女纺线2744斤，织布2772匹，织毛袜6290双、绒袜482双，手套1892双。推进社发放工资8473元。许多纺妇自己挣得了工资，供给了家庭的吃粮和穿衣。妇女纺织解决了群众的生活困难，使新区群众接近、了解和拥护民主政府。并稳定和繁荣了临沂城市，生产推进社的工作初见成效。临沂生产推进社的经验先在山东各地推广继而在其它解放区推行。在此基础上，新区民间纺织和纺织合作事业发展起来，为支援自卫战争打下了经济基础。

民主政府这些具有建设性的措施，不仅造福于新区人民，而且治了穷根，解决了乞丐、娼妓问题。旧社会的罪恶之一——乞丐在新解放区绝迹了。陕甘宁绥德的谢家沟庄，由乞丐村变成了纺织村。过去，村里有众多的乞丐、抽大烟的和赌博者。经过民主政府的教育帮助和组织生产，全村面貌焕然一新。村里有22名男子、58名妇女从事纺织，到处是一片和谐的机杼声和纺车声。又由于民主政府的得力措施，使旧社会的另一个罪恶标志——妓女也绝迹了。单张家口一地，1200多个妓女在妇联会帮助下回乡参加了生产。在解放了的烟台、哈尔滨、焦作、济宁的妓女都跳出了火坑，不再操皮肉生涯了。

二、老解放区妇女运动蓬勃发展

老解放区妇女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广泛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边区妇女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她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为发展解放区的经济、巩固解放区的政权贡献自己的力量。

边区政府和妇女联合会贯彻中央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改变妇女的地位。由于农村妇女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存在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等寄生和依赖的思想，妇女联合会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劳动光荣，劳动发家、

劳动致富的思想。妇女从自己切身体会中逐渐改变思想。妇联会又启发妇女参加生产的自觉性，提出：“大家翻了身，要大家来生产，一起过好时光”，宣传“婆姨汉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的道理，改变妇女轻视劳动的旧思想。边区妇女干部教妇女学纺线并通过妇女中的积极分子发动和带动广大妇女从事纺纱织布生产。陕甘宁绥德纺织英雄刘桂英，拿着自己纺好的线和赚得的棉花挨家挨户地动员妇女纺线。妇女见她纺的线净净的，赚下的棉花白白的。大家羡慕她的光景过得美，吃上喝上穿上了又有零化钱。刘桂英动员妇女群众说：“如今边区遍地一层钱，动手就能拣”。在她的带动下，绥德妇女纺织发展起来了。各地出现一大批妇女纺织英雄，她们不仅自己纺得多纺得快，还把全村妇女发动起来。妇联会又进一步帮助妇女纺织互助、纺织换工变工。促成会纺与会织的结合，有工具的与无工具的结合。太行区武北县垆上村一个寡妇要养活4口人，她纺得快织得慢，供不起家人吃。于是妇联会组织她和织布快手换工，这样，她纺线就维持了全家人的生活。盲妇张妹娥，会纺不会织，但她家喂有牲口，妇联会组织她家的畜力换人工，既解决了村里人用牲口困难又解决了张妹娥不会织的困难。晋绥区兴县杨爱英的村里，公有机子放在会纺会织的妇女家里，根据纺织多少记工顶工，解决妇女没有工具机子的困难。乡村灯油贵，妇联会组织妇女灯油互助，既省油又红火，间歇时间还学几个字，深受妇女欢迎。灯油互助在太行区武卫县很流行。在群众性的妇女纺织生产开展起来后，村里原有的懒婆娘，被人叫做“二流子”的不务正业的妇女也得以改造了。太行区武北县贺进镇妇联会主任把人称女二流子的朱莲的吸收为纺织互助组成员，她在劳动中有了进步，村里人再也没有人轻视她了。边区政府和妇联会通过合作社为纺织妇女解决供销问题，妇女的纺织积极性提高了。妇女为家庭增加了收入，

增进了婆媳、夫妇间的和睦。农忙时，妇女还参加农业辅助劳动，有的妇女还响应妇联会的号召，打破传统旧思想，向老农民学习农业技术。边区农村出现了新的社会风气。在各解放区都涌现出民主和睦的新型家庭。著名的陕甘宁绥德农村郝爱祥家庭，妯娌三人轮流做饭带娃，保证了每天有两人纺线。纺线收入换成了细米，家庭生活得到了改善。山东朱富胜家庭，通过召开家庭会议，朱老太太打破了家长制旧思想，朱大嫂有了家庭主人翁思想，出现了儿媳敬婆婆，婆婆爱儿媳的新家风。太行襄垣李来成家庭，实行家庭成员男女分工、定额、年底分红制。凡超产、节约、帮助同村抗属的都另行奖励。在边区，这类新型的民主和睦家庭改变着封建的旧家庭、旧思想，使妇女的精神面貌有了变化。

由于边区政府大力提倡纺织生产，由于广大妇女积极响应，在抗战后一年中，各解放区妇女纺织人数增多。陕甘宁边区从10几万人增至30万人；晋绥解放区由6万增至20万，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由60万人增至300万人。产量随之增加，河北高阳县近1年的产布量就10倍于抗战时期。晋察冀满城北台鱼村一年的纺织收入3倍于该村的全年农业收入。由于付业的发展，使农产品与日用品之间剪刀差额逐渐降低，从而使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又有了提高。纺织以后的收入又使农民有钱去购买耕牛、农具，扩大了农业再生产的能力。边区的民间纺织抵制了洋线洋布美货的流入，防止了解放区资金的外流，增强了解放区坚持自卫战争的经济实力。所以，边区妇女从事纺织生产，不仅改变了自身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而且为巩固解放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贡献了力量。

边区妇女在政治上也同样翻了身。她们与男人一样参与了政治生活。她们有权检查政府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不少妇女参加了各级农民代表会。有的当选为劳动英雄，群众为她们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她们的劳动受到了社会的尊重，社会赋予她们和男人一样的荣誉，一样的信任。她们中有的被选为各级政权机构的领导，她们行使着为人民服务的权力。1946年4月前，各解放区的民主选举基本上先后结束。妇女踊跃参加了选举投票，妇女参加投票数最高的达90%，最低的为60%，一般为80%。各级政府机构都有妇女。华中妇女有209人参加乡政府，有1374人当村长、村委员。边区各级参议会都有女议员。晋绥765个县有55个女议员。张家口93个参议员有6个妇女。晋绥有省级女参议员9人，山东有省级参议员12人。1946年4月，陕甘宁三届参议会选出议员134人，其中有7名女议员。她们是子长的郝明珠、延川的折碧莲、清涧的白茜，女工代表李凤莲、延长的杨芝芳、米脂的杜瑞兰、合水的路志亮。

为了使解放区人财两旺，民主政府开办助产学校、训练班训练接生人员并改造旧接生婆。陕甘宁的妇女职业学校、晋察冀的训练班学员结业后都分赴乡间从事妇婴卫生工作，减轻妇女的疾病痛苦，减少了婴儿的死亡率。人称王二嫂的李静是深受延安妇女群众欢迎的新法接生员。民主政府还组织中西合作的巡回医疗队为妇女治病，著名的模范医生阮雪华热心为群众治病，足迹遍及延安，张家口、三交薛家坪。

边区民主政府以消灭文盲为目标，在各地均办有识字班、夜校、冬学、黑板报、读书读报班等。山东有妇女民校22,834处，参加识字的妇女达27.7万人。陕甘宁有303所妇女夜校。

随着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边区群众对民主政府的婚姻法规逐渐加深认识，尤其是农村青年男女开始起来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农村出现了争取自由婚姻反对买卖包办婚姻的新人新事。

解放区妇女广泛参与边区的社会生活，妇女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城乡女干部的锻炼成长，不仅加强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而且使自卫战争取得胜利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干部条件。

解放区妇女与男子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在华北联大、北方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大学、华中建设大学、军政大学、鲁艺、医大、党校等学校都给女学生、女干部以深造的机会。不少从平津、上海、沈阳等蒋管区来的进步青年，冲破反动政府的严密封锁，到解放区的大学学习，进步很快，毕业后到民间为人民群众服务。

解放区有《时代妇女》、《山东妇女》等妇女刊物。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上都有定期和不定期的妇女副刊，反映各地妇女工作，交流各地妇运经验，提高妇女干部的文化思想水准。

解放区对于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干部，不管其职务大小，在产假期间，均有一定的优待。如产前产后两个月的假期，给予产妇和儿童一定数目的生活费补助。为解决妇女干部的困难，解放区在经费人力困难条件下，创办儿童保育机构，如陕甘宁第一、第二保育院、延安洛川县托儿所都是解放区著名的保育机构。

解放区培养锻炼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女干部，她们在各级民主政府里担任重要的职务，如女部长、女专员、女市长、女县长等。华中淮安县的孙兰、遵化的白云、河北唐县的陈舜玉、陕甘宁安塞的邵清华都是著名的女县长。担任绥德市市长的彭克、山东县参议会会长的王寅、苏皖粮食部长郭见恩、晋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的孙文淑、晋冀鲁豫太行行署委员刘亚雄等都是著名的妇女干部。

在争取和平民主和准备自卫战争的斗争中，部队、机关和学校的广大妇女干部也投入生产运动并参加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查租查息的各种斗争实践，提高干部素质，成为领导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